

[Studies in Literature]

Been-to Anxiety and Its Zeitgeist in *Chairman of Fools*

ZHANG Tianren ZHU Zhenwu

Shanghai Normal University, China

Received: September 28, 2024

Accepted: October 14, 2024

Published: December 31, 2024

The present study entitled “Been-to Anxiety and Its Zeitgeist in Chairman of Fools” is supported by the national major project “History of English Literature in Africa” (No. 19ZDA296), funded by the National Foundation for Philosophy and Social Sciences.

To cite this article: ZHANG Tianren & ZHU Zhenwu. (2024). Been-to Anxiety and Its Zeitgeist in *Chairman of Fools*. *Asia-Pacific Journal of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4(4), 011–020, DOI: 10.53789/j.1653–0465.2024.0404.002. p

To link to this article: <https://doi.org/10.53789/j.1653–0465.2024.0404.002>. p

Abstract: Shimmer Chinodya, a prominent contemporary Zimbabwean novelist and educator, is among the most renowned writers since Zimbabwe’s independence. In his novel *Chairman of Fools*, madness emerges as a pivotal image that not only serves as a literary device to poetically depict the human mind but also symbolizes the tangible symptoms of societal ills prevalent in Zimbabwe’s specific context. This madness is a pathological manifestation of the nation’s social reality. However, madness is but a superficial symptom; the underlying cause of the characters’ psychological transformations is a profound sense of anxiety. This anxiety, which spans across class, gender, and belief systems, is rooted in intricate and multifaceted motivations. Furthermore, the protagonist’s unique status as a member of the “Been-to” diaspora—a term referring to those who have lived abroad and returned—plays a significant role in shaping this anxiety, conferring it with a more universally resonant chord of the contemporary experience. In post-independence Zimbabwe, the predicament of “Been-to” anxiety is widespread. Thus, understanding the complex anxieties born out of transnational experiences and employing them to probe the psychology of the times holds great significance for enriching the scope of African diasporic literature and for observing the thematic evolution of Zimbabwean literature in the 21st century.

Keywords: anxiety; Been-to diaspora; *Chairman of Fools*; Shimmer Chinodya; Zimbabwean literature

Notes on the contributors: ZHANG Tianren is a master’s student in Comparative Literature and World Literature at Shanghai Normal University, with a primary research interest in African English literature. ZHU Zhenwu is a professor at Shanghai Normal University and the head of the national major project “History of English Literature in Africa,” funded by the National Foundation for Philosophy and Social Science.

《愚者主席》中的賓土焦慮及其時代癥候

張天任 朱振武

上海師範大學

摘要：西蒙·奇諾蒂亞是當代津巴布韋傑出的小說家和教育家，也是津巴布韋獨立後最著名的作家之一。「瘋狂」是他在小說《愚者主席》中呈現的重要意象，這種意象既作為文學作品詩性的心靈寫照，也表現出物質世界真實的時代癥候，是津巴布韋特定社會現實下的病態產物。但瘋癲只是軀體表像，結構其人物心緒嬗變的深層誘因則是焦慮，這種焦慮涵蓋階級、性別與信仰，具有複雜且多維度的深刻動因。與此同時，主人公特殊的「賓土流散」身份成為了建構這一焦慮意識的重要因數，使其鐫刻了更具普遍意義的時代底色。對獨立後的津巴布韋來說，賓土焦慮的困境無處不在。因而，理解由這種跨國經驗所導致的複雜焦慮意識，並以此探究其所映射出的時代心理，對拓展非洲流散文學的內涵、觀測 21 世紀文學的主題轉型具有十分關鍵的意義。

關鍵詞：焦慮；賓土流散；《愚者主席》；西蒙·奇諾蒂亞；津巴布韋文學

基金項目：本文系國家社科基金重大專案「非洲英語文學史」（專案編號：19ZDA296）的階段性成果

一、引言

2000 年是津巴布韋社會轉型的急變期，同時也是其文學主題變革的重要轉捩點。這一時期的作家們受到社會大潮的衝擊，在創作上較少延續先前的民族敘事與戰爭回寫，而更多聚焦「津巴布韋危機 (Zimbabwe crises)」下的種種現實問題。《愚者主席》(*Chairman of Fools*, 2005) 正是此背景下誕生的中篇小說，它是津巴布韋最重要的作家之一西蒙·奇諾蒂亞 (Shimmer Chinodya) 的第五部作品，描述了一個流散者歸國後所引發的身份困境。主人公法萊·查理 (Farai Chari) 是一名黑人作家，他在美國任教、寫作，在他的家庭和非洲社會中都有著良好的聲譽，是一位世俗意義上的成功人士。但在回國後，法萊發現自己的家庭變了：他的妻子維羅妮卡 (Veronica) 變得獨立而「陌生」，他開始無法處理他們之間的關係。越來越多的人參與到其中，但家人的不信任、朋友的不理解讓他愈發惱火，他進而陷入了可怕的痛苦中，並在軀體上產生了各種各樣的幻覺。他被確診為躁鬱癥，最後被送往醫院進行治療。出院後的法萊得到了有效的治癒，但有些問題似乎仍懸而未決。

小說圍繞著法萊歸國後的心境變化展開，並以其逐漸「瘋狂」的情緒遞進揭示了他複雜的內心世界。法萊被確診為躁鬱癥，這一「瘋狂」不僅涵蓋病理上的內因，其背後也承載著更深層次的時代癥候。精神分析學派卡倫·霍妮 (Karen Horney) 認為，所有神經癥都存在一個基本因素，那就是焦慮，以及為了對抗焦慮而建立的防禦機制^①。顯然，法萊的躁鬱癥正是他焦慮的軀體表現，這種焦慮包含了家庭博弈、性別矛盾與信仰抉擇，具有複雜的深層動因。另一方面，法萊的跨國身份是這一過程中不可忽視的要素，其致使他在家庭、信仰與意識形態等諸多方面疏離於非洲本土，阻礙了其與過去環境的和解，進而成為了其焦慮意識形成的重要推手。朱振武在構建中國非洲文學學時提出了「賓土流散」(*Been-to diaspora*)^② 這一概念，用以指涉在海外定居的流散者返歸本土後所引發的身份困境，而這與法萊的境況十分呼應。因此，本文將這兩種核

心概念結合，從「賓土焦慮」這一視角出發，以此探究其背後具有普遍意義的非洲社會問題與時代心理。

二、燃燒的卡羅拉：「物」的焦慮和失敗的博弈

「存在心理學之父」羅洛·梅(Rollo May)在其著作中指出，「競爭性個人主義不利於社群經驗，社群的缺乏更是當代焦慮極為重要的因素。」^③這句話一石二鳥，分別向我們點出了小說主人公癡候的因與果。而理解他由此引發的第一層焦慮，則要從文本中的「汽車」開始說起。從故事的開始，法萊·查理就被包裹在無形的不安中。他從美國回到家中，卻並未享受榮歸故里的侍候，取而代之的是妻子維羅妮卡的不聞不問。這種態度讓他極為不滿，但他又無處發洩，甚至找不到她在哪裏。惱怒之下的他陷入瘋狂，他不顧勸阻闖入了維羅妮卡所在的公司，一群員工詫異地接待了他：「她們不懷好意地竊竊私語，避開他的目光。他認識其中一個叫格蕾絲的人，大約十二年前，他開著自己的大眾高爾夫去接維羅妮卡，那時維羅妮卡還是個會計助理，沒有公司的車。」^④顯然，這段描述中的一個細節值得注意，在回憶這段過去的情境時，法萊的腦海中首先出現的差別座標是「車」，並刻意強調了兩人「車」的擁有懸殊，而這暴露出他焦慮的第一個重要根源。

在法萊的潛意識中，區分過去與現在最重要的標誌是車，換句話說，「維羅妮卡是否擁有汽車」的事實成為了法萊處理與她關係最核心的時間界限。顯然，「汽車」這一意象在小說中並非單純的情節工具，而有著某種特殊的指認意志。文本中對汽車的描寫格外詳細，從顏色到品牌，達特桑、馬自達、卡羅拉……每個人物的出場都伴隨著對汽車的描述，並且它往往是「先於」人物而出現的：「一輛帕傑羅停在他面前，他的朋友菲利普從車窗裏喊道……」^⑤「一輛白色寶馬駛入停車場，老同學辛比薩伊沖他嚷道……」^⑥這表明，車在小說中具有與人物同等的敘述生命力，它像《南方高速》(La autopista del sur, 1966)中那樣代替了對人物面貌的細緻刻畫，而成為某一角色的精神化身，譬如藍色卡羅拉之於維羅妮卡，或是白色皮卡之於威爾伯特(Vilbert)。但值得注意的是，作為雙相情感障礙者(Bipolar disorder)，法萊在文本中並非可靠的敘述者，其所感所知均包含了強烈的非理性成分。換句話說，文本中「汽車先於人物」的視覺現象是法萊焦慮意識的不自覺外化，而非敘事策略。在這種焦慮下，法萊對於汽車「依賴」的執念在小說中顯而易見。車禍是故事的第一個重要轉捩點，丟掉了汽車的法萊隨即陷入了極大的恐慌中，他仿佛失去了理智。他一邊在不斷催促汽車公司修好車的同時，一邊千方百計地試圖攫住某種東西去填補內心的恐懼。驅使之下，他「抓住」了自己的孩子們，並將他們強迫性地限制在了自己身邊。但這並沒有在根源上解決他的焦慮，他的潛意識外化為幻覺，通過妹妹的口告訴他：「如果您的汽車還沒有準備好，那麼緊緊抓住孩子們是沒有用的。」^⑦他於是陷入了更深的恐慌中。顯然，對他此刻的危機來說，汽車比自己的孩子具有更重要的意義。因此在車被修好後，他的精神狀況得到了顯著的緩解：「哦，再次回到移動的車輪上，方向盤穩穩地握在他的手中，感覺真好。」^⑧有趣的是，這是全文中讓法萊唯一感到「舒適」的時刻。那麼，汽車對於法萊而言，究竟意味著什麼？

車即「財富」，對於彼時的非洲意識來說正是如此。法萊對車的焦慮本質上浸染了新的意識形態，即資產階級思維對「物」的需求，在這種需求下，他與妻子維羅妮卡所維持的傳統家庭形態被隱性地破壞了。作為久居國外的「賓土流散者」，在美國長期的生活與創作，在法萊的認知邏輯中刻下了濃重的中產文化和資產階級烙印。回國後，他不再以傳統的父權制家庭觀審視他與妻子的關係，而是取而代之一種經濟博弈的思維，即「競爭性個人主義」。在維羅妮卡對他的控制表現出反抗時，他並不以傳統的非洲式思維認為她「冒犯」了丈夫的權威，而是轉而開始與她較量：「那個女人跟我競爭簡直是自尋死路」，因為在他看來，維羅妮卡在經濟能力上完全無法與自己抗衡，他怒氣衝衝地向別人控訴：「我掙的錢是她的三倍……她根本不明白感恩這個詞意味著什麼。」^⑨正如馬克思(Karl Marx)在《政治與哲學基本著作》(Basic Writings on Politics and Philosophy, 1959)中所指出，「金錢意識撕破了家庭中『情感的面紗』，使得家庭關係僅僅為一種金錢關

系」^⑩。顯然，在說出那句話時，法萊夫妻觀念中「你必須聽我的」的先決條件已經從「因為我是你的丈夫」潛移默化地被替換為了「因為我比你掙更多的錢」，而完成了從傳統以「性別」為主導的家長制觀念到以「經濟價值」為主導的新型家長制觀念的轉變。這種轉變正是資產階級意識形態的具現，是標誌著普通人際關係向以金錢為基礎的物質財富關係的轉變，具有顯著的貨幣拜物教色彩。然而，法萊的悲哀在於，無論他如何暴跳如雷地聲明自己的經濟實力，他的拳頭始終像是打在棉花之上：擁抱五旬節教派（Pentecostalism）的維羅妮卡並不從屬於這個「體系」，她抗爭的底氣也並不來源於自身的財富。因此，他的憤怒反而招致了更深的奚落：「別誇大其詞了。你充滿了自憐，你只是崇拜金錢……」^⑪因而在博弈中，法萊毫無疑問地「失敗」了，他發現自己並不能以此鉗制住維羅妮卡，但他的行事邏輯使其始終無法擺脫路徑依賴，這才導致了他的焦慮。

羅洛·梅認為，中產階級在經驗到焦慮時，會更加努力地積累個人財產來尋求安全感，但這種依賴反而會使其加劇，因為這種以財富積累為前提的個人主義假說正是焦慮的根源^⑫。顯然，法萊歸因策略的失敗驅動了焦慮的惡性循環，讓他在強化對「物」焦慮的同時，衍生出對自身無法再以「物」來延續控制的焦慮。因此，「車」正是在該思維下扮演了這樣的角色。汽車是物質財富的重要體現，更是法萊在與外界對抗時自身「力量」的全部籌碼。在對「物」焦慮的驅使下，它無形中與法萊「融為了一體」，成為了他意志的一部分，甚至是主導力量。在文中，他會與自己的車對話：「該死的，在他最需要的時候，他的車怎麼能這樣對他呢？」^⑬他的車會自己開：「他甚至哀求它，『求你了，車，別讓我失望，寶貝。再開幾公里，求你了。』」^⑭在他訴說回憶時，小說中竟這樣描寫：「他掛上倒車擋，並告訴了她所有的事情」^⑮——而這一情景是發生在醫院的病房裏。在車禍發生後，法萊失去了他的車，也失去了他賴以掌控與他人關係的底層寄託。如此焦慮下，他無意識地向身邊的每一個人聲明「我的車正在維修」，並且「很快就會修好」^⑯。他似乎認為，失去了汽車的自己再也無法對曾經的「弱者」頤指氣使，尤其是對維羅妮卡，而維羅妮卡居然有了屬於她的車，這更讓他無比惱火。所以他才會在回憶中刻意地強調，「那時維羅妮卡還是個會計助理，沒有公司的車」，而他曾「開著自己的大眾高爾夫去接維羅妮卡」，在這種對比下，他受損的自尊才得到了一絲安慰。在他看來，「有車的維羅妮卡」和「無車的維羅妮卡」是完全不同的兩個人，汽車是破壞他的家庭、扭曲妻子面貌的罪魁禍首，這種潛意識外化為精神分裂的感知，這才導致了小說中對汽車的反復刻畫、描寫。他恐懼維羅妮卡的那輛藍色卡羅拉，因為那是他博弈失敗的見證者：「他對坐她的卡羅拉車或靠近它感到不安。自從她買了這輛車，或者說，自從她的公司把這輛車作為福利賣給她之後，他坐過的次數就沒超過兩三次。事實上，這輛車代表了他對妻子和她工作的公司的所有怨恨。」^⑰有趣的是，即便是在敘述她擁有車這一事實時，法萊也必須強調它是公司「作為福利」賣給她的，以此來緩解內心的不滿。顯然，他無法接受自己在「物」的博弈中的失敗，更不知道自己失敗的原因，最終招致了他精神狀態的完全失控，而其所映射出的，正是跨國經驗所割裂出的「兩個世界」的隔閡。在這種隔閡下，重返社會的賓土者與原生關係之間產生了強烈的連接障礙，意識形態的差異使得他們不僅無法溝通具體的問題，連相互理解都變得格外困難。這種隔閡一旦形成便再難彌合，這才造成了他們的焦慮。而法萊尚未意識到的是，以他為代表的跨國行為所導致的不僅僅是意識形態衝突，還有著更為顯著的時代性別危機。

三、妻子還是丈夫：男性氣質焦慮與家庭危機

在家庭場域內，賓土流散的危機並不是單向所致，而是隱性合力作用下的結果。對於流散主體來說，這種來自他者的力量不僅昭示了被顛覆的非洲家庭關係，還引發了具有時代底色的性別衝突。法萊博弈的失敗並非來源於「物」的缺失，而是兩種觀念碰撞下的必然結局。其既有的傳統家庭觀由於跨國經歷而浸染了

資產階級色彩，導致了他對「物」的執念，而他並未意識到的是，由於他的跨國行為，維羅妮卡的家庭觀念同樣發生了轉變，在這兩者的共同作用下，他們原有的家庭秩序被徹底地破壞了。而這不僅構成了他失敗的重要原因，還引發了不可逆轉的男性氣質危機。這種危機構建了他對維羅妮卡恐懼、反感的另一面，強化了他的焦慮體驗。

「變化」是《患者主席》情節驅動的核心，也是法萊瘋狂的直接誘因。回國後的法萊感覺自己的妻子十分陌生：她不再像從前那樣依賴自己，而是獨立、強大，有自主的生活喜好和宗教信仰。她在事業上蒸蒸日上，還提了一輛新車。法萊驚恐地發現，此時的維羅妮卡已然並不需要自己，他無法接受這種變化，從而引發了一系列的精神崩潰。顯然，法萊的癡狂來源於維羅妮卡的轉變，更具體地說，是他與維羅妮卡夫妻關係的轉變，而這一切的成因正是他的「賓士」行為。以法萊為代表的跨國家庭並未完成整體的遷移，而是以「男性外出，妻兒留守」的形式維持。在這一過程中，由於男性在家庭空間中的撤離，女性不得已去填補年輕丈夫留下的空缺，而逐漸扮演起男性的角色。她們開始行使原本屬於男性的特權與權威，出入男性居多的社會場所，逐漸佔據了原本屬於男人的空間。正如西蒙娜·德·波伏娃(Simone de Beauvoir)所說，「人並非生來就是女人，而是成為女人」^⑧，反之亦然。生存壓力與留守孤獨強化了性別扮演產生的無意識認同，久而久之，具有「女性男子氣概(Female masculinity)」的妻子就這樣誕生了。此時，維羅妮卡們已不再是幽怨柔弱的邊緣者，而蛻生為自由主義精神下的新「人」。另一邊，妻子獲得了「自由」與「重生」，而對丈夫這一身份的打擊卻是毀滅性的。回國後的男性在重新融入家庭關係中面臨著前所未有的困難，法萊顯然也是如此。他無法接受妻子對自己丈夫身份的置若罔聞，指責維羅妮卡不為自己準備早餐，不做家務，也完全不過問家中情況。他歇斯底里地希望她辭去工作，回歸到自己的庇護之下：「我告訴過她很多次，讓她辭職為我工作，但她不聽，她一心只想著升職……」^⑨在未得到積極的回饋後，他隨即就陷入了病態的狂躁中。事實上，法萊的焦慮正來源於其矛盾：他像傳統男性一樣保留著戈德曼(Goldman)式的父權制哲學，認為婦女應當同意其作為男性附屬品的地位並始終保持順從，同時，他又希望自己在離開期間，妻子能夠獨當一面地以「女性」的身份處理好一切，但這顯然是不可能的。並且，由於跨國分離而產生的性別置換，與現代家庭境況中的「喪偶式育兒」有著質的區別。後者由於分工不同仍然保持著父權模式，而前者因為單一職能的完全撤離產生了身份重組，進而導致了無法調和的結構性危機。法萊對這兩者性質的混淆遮蔽了他看見這種危機，他仍然將自己視為家庭唯一，而且是不可替代的供養者，並將維羅妮卡的冷漠視作是事業起色的高傲，殊不知其早已掙脫了他認知中的「妻子」身份，而擁有了更為現代性的性別認同。與此同時，法萊的焦慮又是一個縮影，他展現了彼時的經濟困境下，相當數量的非洲家庭所面臨的普遍現實問題。事實上，跨國家庭在2000年後的非洲已屢見不鮮。蓋伊·達斐(Gaye Daffe)在研究中稱，每十個塞內加爾人中就有一個家庭成員移居國外，幾乎有一半的家庭有親戚生活在外國。^⑩而在同時代的津巴布韋，貨幣崩壞造成了嚴重的就業、醫療等生存問題，這種恐慌情緒同樣導致了數量驚人的大規模移民，這些移民大多以「男出女守」的形式發生，並在上述模式的複製下催生了難以逆轉的家庭危機。而回國後的男性無法接受，也意識不到來自妻子的這一轉變，在這種焦慮下，法萊們重新融入家庭關係的過程就不可避免地遭遇了阻力。

在外部，五旬節教會的介入不但沒有幫助其化解這一阻力，反而加劇了氣質危機的進程。法萊的焦慮不僅來源於他無法支配維羅妮卡的行動，更讓他難以忍受的是維羅妮卡反過來對自己行為的干涉。小說中多次出現酒這一意象，它與卡羅拉汽車一樣，是法萊對維羅妮卡意志恐懼的外化表現。維羅妮卡不允許法萊在任何場合喝酒，這對嗜酒如命的他來說痛苦不堪：「她一輩子都沒給我買過啤酒」^⑪。在兩人夫妻關係惡化的進程中，酒扮演了潛在的核心角色。酒既是維羅妮卡完成「攻守易勢」話語博弈的武器，也是割裂法萊與他妻子世界的利刃。酒的存在讓法萊與維羅妮卡徹底從屬於兩個不同的「世界」，並促成了他們完全無法相互理解的最終境地，而該過程的核心推手正是五旬節教派。在法萊出國期間，維羅妮卡信仰了該教派，

「不允許喝酒」便是其中的教義之一。但這似乎不是她阻止法萊飲酒最重要的理由，因為她的妹夫謝伯德（Shepherd）在教會身居要職，也並未放棄喝酒的習慣。問題的關鍵在於，2000年後的津巴布韋五旬節主義在思想上經歷了重大的轉變。在當時，許多津巴布韋人因經濟困難而皈依該教會，而它不僅向教徒們許下擺脫困境的承諾，還宣揚了一種具有戰鬥性和攻擊性的性別認同觀，以此為克服現實上的困難做準備。這種性別認同觀從前提倡「軟性」的男子氣概轉變為提倡「硬性」的男子氣概²⁵，它不僅慫恿了男性，也影響了一部分渴望改變自身地位的女性。馬丁·林哈特（Martin Lindhardt）在研究新五旬節主義對坦桑尼亞男性的影響時也指出，五旬節派對社會和文化變革進程的最大貢獻在於，它以新的方式塑造性別角色和性別身份，及讓其團體中的女性「學會了與未皈依的丈夫打交道的策略，並獲得了一套新的解釋框架來理解男性的侵略性和不負責任的行為」²⁶。顯然，維羅妮卡的「自信」正來源於此，而這種思想與法萊撤離家庭空間後的現實處境相互自洽，也就是說，在無意識的身份置換與主動的性別認同的合力作用下，維羅妮卡們的「女性男子氣概」在家庭實踐中不斷得以鞏固、強化，最終導致了他們關係的重大轉變。

此外，第三世界的文學不僅是個人危機的文學，還是「集體危機的文學」²⁷。這場男性氣質危機的背後，還摻雜著某種由政治引發的普遍社會意識。作為津巴布韋史上最重要的政治家，羅伯特·穆加貝（Robert Mugabe）具有複雜的歷史地位。他帶領津巴布韋從英國殖民下完成獨立，被視為「國父」，並為獨立後的國家建設帶來了諸多積極的影響。他是民族解放的光輝象徵，對津巴布韋的發展有著難以磨滅的貢獻。但他同時也是政治上的獨裁者，其偉岸形象與他的獨裁手段賦予了津巴布韋人民集體無意識中深刻的父權色彩，並形成了維持其強權統治最根本的社會意識形態。這種父權意識塑造並強化了津巴布韋的社會結構，尤其是家庭結構，在相當長的時間內無形地阻礙了本土女性主義的崛起²⁸。然而，獨立後穆加貝的統治並不始終盡如人意，種族衝突和經濟危機愈演愈烈，質疑的聲音越來越響，這種糟糕的狀況在2000年的「快車道改革」（Fast Track Land Reform Program）²⁹後達到了混亂的頂峰，也造就了被我們稱為「津巴布韋危機」的歷史時段。穆加貝的信譽一落千丈，甚至有人在街頭公開舉出「穆加貝必須滾蛋！」字樣的橫幅³⁰。顯然，這場由懷疑、失望和憤怒填充的社會風暴不僅與經濟政策的失利有關，它同樣昭示了其漩渦中心——穆加貝這一「大人物」賴以統治的男性話語的衰落。小說中，維羅妮卡對法萊先後經歷的期待、失望到最後的反抗，與津巴布韋社會意識對穆加貝政府公信力的轉變如出一轍，這也印證了弗雷德里克·詹姆遜（Fredric Jameson）的那句話，「第三世界的文本，即使是那些看似私人的文本……也必然以國家寓言的形式投射出政治層面：私人命運的故事總是第三世界公共文化和社會動盪局勢的寓言」³¹。顯然，法萊的焦慮與危機並非僅僅個體所致，而能窺見其深刻的時代烙印。「大人物」的政治危機間接催生、強化了「一言堂」話語體系的萎靡，法萊男性氣質的衰竭折射出津巴布韋獨立後父權敘事的羸弱，集體無意識的運作下，本土女性主義的勃興也顯得有跡可循了。

四、「骨頭」還是《聖經》：信仰焦慮與價值困境

如果說由「賓士」所導致的家庭與性別危機是具體、可見的，那麼在此之外，流散文學普遍還存在著更為深層的焦慮意識。這種焦慮難以驅散、不可名狀，是歷史與時代共同作用下的產物，代表著具有原型意義的非洲命題。小說中，修好了車的法萊仍然備受痛苦，他的精神瀕臨崩潰的邊緣，幻覺體驗也變得愈發嚴重。顯然在他的潛意識中，仍存留著某種揮之不去的幽靈。他遊蕩在街頭，看見了自己已故的兄長德茲邁（Dzimai），他「像影子一樣在人行道上徘徊」，然後「逐漸消失，像一團水蒸氣一樣落在旁邊的副駕駛座位上」³²，他引導法萊回到了自己的「家」。在「家」中，法萊看見了自己的母親和許多已逝的親人，他走進房間並坐到了床邊：

他走過去，坐在床邊陪她，她小心翼翼地從杯子裏抿了一口。臥室裏沒有肉身的氣息，床單上也沒有任何標識。床是空的，但她就在那裏。他抱抱枕頭，拍拍床墊，把嗎啡瓶子放在邊上的桌子上，然後親吻她的額頭。^⑧

這段描述中的兩個細節值得我們注意。首先，對「沒有肉身氣息」的強調，表明這是一個僅容納靈魂的空間，而這種空間指向了津巴布韋傳統的祖先信仰，即對「祖靈」的崇拜和歸屬。另一邊，床單上沒有「標識(Logos)」，這個標識指的是維羅妮卡公司的標誌，在前文的真實世界中，法萊的家中因為維羅妮卡的佈置而到處是這個標誌，這一度讓他感到恐懼和厭惡。顯然，床單上的標誌是維羅妮卡意志的化身，代表了她的某種「身份」，而它在幻覺中的消失，表明在法萊的意識世界中，「標識」與「祖靈」的關係是對立的、互不相容的。那麼，它到底意味著什麼？

這一端倪為我們揭開了法萊焦慮意識的另外一角，即在信仰游離中的價值困境。正如麥克盧爾(John A. McClure)所說，後現代小說家總是喜歡「將不同的世界並置」^⑨。《愚人主席》中存在著兩種信仰體系，即傳統信仰與五旬節派，這兩種體系潛在地將故事中的世界一分為二，並給歸屬於每個體系中的人物打上了特定的烙印，例如那個被描述為「典型的家庭男人，為兄弟們娶妻，訓斥犯錯的姐妹的丈夫，埋葬族人」^⑩的好友威爾伯特，就代表著維繫傳統秩序的世界。而法萊卻是文本中的「第三者」，他不從屬於其中任何一種。作為海外歸來、事業有成的中產者，在美國的「賓士」經驗賦予他的理性主義意識，讓他不再能夠真正融入津巴布韋的傳統信仰，而對於五旬節派與基督教，他早年進行過嘗試，但那種熱情也「由於對地獄和硫磺的恐懼而在青春期的罪惡中消磨殆盡」^⑪。他沒有具體的信仰，但他始終無意識地在向兩種體系進行嘗試性靠近。因為在他的潛意識中，沒有信仰是悲哀的、無法長久的，所以這兩種信仰元素才會在他的幻覺中反復出現，比如在黑暗中他看見的神甫，比如收音機裏他聽到的並不存在的歌聲「被祖靈附身的人永不會死」^⑫，等等。在情節的推進過程中，每當他的心緒陷入低谷，潛意識中的兩種陣營就會以幻覺的形式向他發出「邀請」。但這些邀請均以失敗告終：作為精英知識份子，他無法接受傳統舞蹈的粗野，也難以認同詭譎的巫術治療手段，因此在病房中拒絕聽從「疙瘩先生(Mr. Pimples)」的「牛奶警告」^⑬；他也無法完全擁抱五旬節教派，因為那裏攜帶了他妻子的烙印，標誌著他空間角逐的敗北。顯然，床單上的「Logos」所代表的正是維羅妮卡所從屬的五旬節教派，所以在幻覺所引導的精神世界裏，他本能地拒斥了維羅妮卡給出的「選項」，而試圖擁抱傳統信仰，但最後還是以失敗告終：「他厭倦了這些咆哮，又回到了休息室」^⑭。因此，他自始至終都處在無意識的信仰焦慮中。從這個層面來說，法萊在文本中對維羅妮卡的恐懼有著另一層微妙的動機，即對於信仰選擇的恐懼。維羅妮卡「獨立」的成功強化了他的信仰焦慮，他羨慕這種「成功」，她的出現似乎在無形中不斷催促著他進行信仰的抉擇並給出「答案」。他自己都並未意識到，信仰祖先的親友與皈依上帝的妻子像是懸掛在他頭頂的兩把利劍，每當他與其中的一方接觸之後，他的焦慮感受就會顯著地加深一分，因此他在不斷嘗試選擇卻又不斷失敗後，最終在這種焦慮中崩潰了。這也解釋了為什麼，法萊始終被一種巨大的不安全感所包裹著。每當他來到人群密集的空間時，他的不適就會迅速展現：「人群讓他感到不安」「他覺得自己被困住了」^⑮。這樣的不安全感本質上來源於被熟悉文化拋棄的恐懼，回國後，津巴布韋的二元文化體系讓他感到陌生、排斥，他覺得自己已沒有了安身之處。

就像弗洛伊德所說，創作是個體無意識結構的過程，文本內法萊的焦慮同樣折射出文本外作者的困惑。在奇諾蒂亞看來，法萊對信仰承諾的缺失是民族意識建構的悲劇，正如他在小說中借圖邁叔父(Sekuru Tumai)之口獨白的那樣：「這樣一個優秀的、受過教育的年輕人，卻如此絕望。他們都受過良好的教育，但仍然赤身裸體……書本，書本，書本。他們只知道這些……對於黑人來說，除了《聖經》和祖先的靈魂，別無選



擇。也許還有科學。沒有人能永遠空轉」³⁸。「別無選擇」,身為與法萊一樣的非信徒,這也同樣體現了作為敘述者的奇諾蒂亞內心的焦慮。在他的作品中,只有在黑人們沒有面臨「非洲挑戰」的情況下,他們才會「暫時地」尋求基督教的庇護。而一旦他們面臨那些「傳統」的苦難、不幸和死亡,他們就會回到自己的祖先那裏找尋寄託。這在他的另一部小說《紛爭》(*Strife*, 2006)中得到了充分體現:對《聖經》充滿虔誠的鄧格(Dunge),終其一生都生活在上帝遮風擋雨的庇護之下,但當他的兒子在新婚之夜癲癩發作時,他卻不由自主地皈依了被他丟棄了40年的祖先信仰之中。這樣的例子在作品中比比皆是,他們「在自我身份認同方面產生了糾結與疑惑,在到底是做一名傳統主義者還是基督教徒之間遊移不定」³⁹。或許是站在教育者的高度,奇諾蒂亞認為民族意識中的價值觀需要依賴信仰來實現鞏固,所以在《愚者主席》中,他將自身的焦慮無意識地投射在了法萊的身上,以期找到答案。但他很快又放下了執念,他意識到這種思想的狹隘性,並借助清醒的法萊之口試圖驅散焦慮:

「是祖先還是巧合,是陽光還是惡風,是骨頭還是聖經,是科學還是命運,我得繼續我的生活。我才不管什麼傳統或所謂的現代性——這種看待生活的方式太簡單了!如果上帝、祖先或命運站在我這邊,那很好,我歡迎他們加入。我就是我,我會活,我會愛,我會笑。」⁴⁰

I will be ME, and I'll live, I'll love, I'll laugh. 但這看似充滿自由的「現代」宣言,也許並不能真正地抵達自由。事實上,這種不安的癥候或許永遠不會徹底消弭。法萊們對信仰抉擇的焦慮並不只是單純的文化與身份命題,它更是先驗的、根植於每個黑人集體無意識中的歷史性問題。從恐怖的奴隸貿易到殘酷的殖民統治,再到獨立後破碎的社會亂象,在文化「尋根」的場所中,新一代的黑人從未有過真正的安寧時刻。他們因為工作、學業或政治而頻繁地往返於歐-非兩大文化系統中,在兩股巨大力量的擠壓下如履薄冰。恩古吉·瓦·提安哥(Ngugi Wa Thiong' O)、奇瑪曼達·恩格齊·阿迪契(Chimamanda Ngozi Adichie)、丹布達佐·馬雷切拉(Dambudzo Marechera)……他們不斷離開卻又不斷回歸,因而始終不由自主地處在「賓土」的困境中。他們的創作中充斥著無法和解的矛盾,顯現出他們自身都難以覺察的心靈痛苦。這些痛苦和這種困境生髮出的焦慮超越了具體的現實境況與代際關係,如同「歷史的幽靈」般纏繞在每個黑人的周身,成為了難以名狀的附骨之疽。因此,法萊的賓土焦慮並非個人的焦慮,而是黑人的焦慮、時代的焦慮、歷史的焦慮。在這種意義上,賓土流散的深層內涵解除了事實的限制,而具有了更先驗、更形而上的歷史美學內核。

五、餘論

賓土書寫是非洲文學永恆的命題,其本身就體現出強烈的焦慮內核。這一點,無論是對於歐洲人還是非洲人來說都是如此。欽努埃·阿契貝(Chinua Achebe)曾說:「在歐洲文學作品中,受過教育的非洲人的形象相當令人反感……所有這些人都接觸過歐洲文明,但卻對歐洲文明束手無策,一回到家就崩潰了。這樣的描寫很吸引人,但這是種族主義行徑的一部分……」⁴¹顯然,這種詆毀性形象⁴²的建構透露出來自西方書寫者的焦慮,即對被他們所規訓的非洲人掌握、顛覆這種文化的恐懼。而另一邊,非洲作品中「受過教育的非洲人」形象同樣令人玩味,他們不僅對歐洲文明束手無策,對非洲文明依然「束手無策」,同樣「一回到家就崩潰了」。因而對非洲作家而言,這類形象同樣是焦慮的外化表現,他們希望成為非洲振興的「英雄」,卻在矛盾與沮喪中變為了「瘋子」,就像法萊·查理一樣。究其原因,「賓土」帶來的徙移撕裂了個體的文化空間,導致了流散者游離於「兩大世界」的悲劇。法萊的精神空間是脆弱、破碎的,他既不能懷抱著強大的力量立足於兩個世界之上,探索屬於自己的「第三空間(The Third Space)」,也無法像《紛爭》中的鄧格那樣,歸屬其一



並找尋到真正安全的「庇護之處」。他既浸染了模糊的資產階級意識，又殘留著微弱的傳統家庭觀；他既希望妻子具有獨當一面的能力，又排斥她成為一個像他一樣的自由的「人」；他既沒有矢志不移的無神論精神，也缺乏對祖先信仰和五旬節教的深入理解。正如南非諾獎得主納丁·戈迪默(Nadine Gordimer)在討論《詮釋者》(*The Interpreter*, 1965)時所指出，賓土流散者們可以通過綜合他們的非洲和歐洲文化經驗而不再是「Been-tos」，但同時她也認為，這種綜合是一種脆弱的、批判性的綜合，是建立在對兩個世界的精神不足的認識之上的。⁴³如此脆弱而膚淺的游離，是法萊悲劇的核心根源。他本可以依靠自己優越的學識條件成為兩種文化的溝通橋樑，又或者憑藉自身不俗的認知水準驅散迷霧，找到屬於自己的文化歸宿。但他都沒有做到，他沉浸在看似無解的事實困境中任由焦慮被偏執所驅使，最終在這種焦慮下毀滅了。而他的焦慮也映射出了這片土地上，所有那個時代的賓土流散者的命運。

因此，焦慮既是奇諾蒂亞小說中的重要主題，同時也是非洲文學書寫時代的經典媒介。正如勃蘭克斯(Gerog Brandes)所說，文學情調的表現總是「同特定的心理狀態相適應」⁴⁴，而呈現出具有普遍性質的心理範式。法萊的「瘋狂」是一種複雜的時代癥候，它同時兼具了病態心理機制與抽象書寫策略的雙重表現功能。首先，從創作技法上來說，法萊的瘋狂是時代心理的抽象喻體，是賓土流散者「無處安身」與 21 世紀津巴布韋民眾失意、絕望的詩化表徵，它與「骯髒」、「暴力」和「苦難」一起，在表現主義的大廈中建構出非洲現實的暗沉一面。另一方面，這種瘋癲同樣包藏著有跡可循的心理機制，是作家與人們趨避現實的真實回饋。對此，穆赫姆瓦(Kizito Muchemwa)有過精準的概述：「在新一代故事講述者創造的虛構世界中，理智是一種非常奇怪的商品。津巴布韋的紹納語和英語作家一直被挫折、無望和失落所困擾，以至於將瘋狂作為一種逃避手段。」⁴⁵而在深層機制上，卡倫·霍妮也指出，「焦慮的合理化是逃避責任的最佳藉口，它的實質是把焦慮轉化為合理的恐懼。」⁴⁶這種恐懼經過發酵、強化，最終以病癥的形式外化出來，就像法萊·查理一樣。換句話說，在難以調和的現實困境之下，個體的潛意識為了趨避精神上的危險釋放出焦慮，而焦慮又以物質的形態催生出軀體反應，即真實的神經癥狀，現代心理學所定義的「自我設障」(Self-handicapping)，也正來源於此。而這一點，同樣為作為接受者的我們在分析焦慮這一具有典型性的書寫表徵時，提供了更加科學的路徑依據。

最後，賓土焦慮背後所潛藏的種種問題，奇諾蒂亞似乎也並未給出答案。五旬節教徒禁止自己的配偶飲酒，並過分參與教會事務而疏遠家庭是否正確？融入了中產階級色彩的新非洲家庭抵抗這種具有攻擊性的性別認同，是否合理？現代津巴布韋人是否一定要有某種信仰？誰又應該來為法萊的瘋狂與焦慮買單？這些疑慮在文本中懸而未決。顯然，小說雖已法萊作為第一視角，但卻難以觀測作者的敘述立場。站在法萊的角度，維羅妮卡疏遠家庭的行為，無疑是新時代宗教系統對社會關係的分裂；從維羅妮卡的立場來看，這似乎又是女性話語力量崛起的一次重大突破；而如果站在第三者的視角去審視，法萊所困的這種「對客觀世界和現實秩序的不安定感」中，則又有了更形而上的後現代性意義。「现代主义小说需要读者参与建构交流才能实现阅读」⁴⁷，這些態度似乎都有其合理的一面，奇諾蒂亞並未給出傾向，這種處理也賦予了小說以明顯的複調與世界主義⁴⁸色彩。從另一個層面來說，其複調性也體現出文本外作為敘述者的焦慮情感。他無法解決這種矛盾，也並不知道應該看向何處。「但是，埃裏克，為什麼他看不到自己正經歷著什麼？……太多的書本知識，這就是原因」⁴⁹——他在小說中對法萊的戲謔，似乎也在無形中鞭笞著文本外迷惘的自己。經濟改革的失利、穆加貝政府的腐敗、餓殍遍野的社會現狀、激烈的種族矛盾與信仰衝突、現代與傳統意識形態的相互絞殺、難以調和的家庭問題……爆炸式增長的移民下，津巴布韋的未來會怎樣？也許那時的奇諾蒂亞比法萊·查理和我們更想知道答案。而這些疑慮的背後，也正透露出 21 世紀津巴布韋文學主題轉型的思想嬗變軌跡。

注釋

- ①④⑥ 卡倫·霍妮(著),馮川(譯):《我們時代的神經癡人格》,貴陽:貴州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頁10+31。
- ② 王卓,孫曉萌:《中國非洲文學學與非洲文學的批評路徑》,《廣東外語外貿大學學報》,2023年第4期,頁46。
- ③⑫ 羅洛·梅(著),朱侃如(譯):《焦慮的意義》,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10年版,頁161+159。
- ④⑤⑥⑦⑧⑨⑪⑬⑭⑮⑯⑰⑱⑳㉑㉒㉓㉔㉕ Chinodya, Shimmer. (2005). *Chairman of fools*. Harare: Weaver Press.
- ⑩ Karl Marx, Frederick Engels & Lewis S. Feuer (Ed.). (1959). *Basic writings on politics and philosophy*. New York: Doubleday, p. 10.
- ⑰ Simone de Beauvoir & H. M. Parshley (Trans.). (1953). *The second sex*. London: Jonathan Cape, p. 273.
- ⑲ 詳見 Gaye Daffé & M. C. (Ed.). (2008). *Les Transferts d'Argent des Migrants Sénégalais: Entre Espoir et Risques de Dependence. Le Sénégal des Migrations, Mobilités, Identités et Sociétés*. Diop, Paris: Karthala, pp.105–132.
- ⑳ 「軟性男子氣概」即主張男性的忠誠與潔身自好,主要針對婚姻中的家庭關係。「硬性男子氣概」強調「戰鬥」與「奇跡」,是2000年之後經濟危機下的產物。這一結論詳見 Diana Jeater. (2016). *Masculinity, Marriage and the Bible: New Pentecostalist Masculinities in Zimbabwe*. In Andrea Cornwall, Frank G. Karioris, and Nancy Lindsfarne (Ed.), *Masculinities under Neo-liberalism*. London: Zed Books, p. 165–182.
- ㉑ Martin Lindhardt. (2015). *Men of God: Neo — Pentecostalism and masculinities in urban Tanzania*. Religion, p. 254.
- ㉒ 蔣暉:《論非洲現代文學是天然的左翼文學》,《文藝理論與批評》,2016年第2期。
- ㉓ 與穆加貝的統治手段一樣,他的各種社會主張均具有強烈的父權色彩。穆加貝經常利用出席人數眾多的婚禮和葬禮的機會發表講話,抨擊「小家」習俗,支持一夫多妻制。他聲稱這給予了妻子及其子女尊重和認可,保護了她們免遭貧困與遺棄,並將其與五旬節主義中的神話典故結合起來賦予其道德合理性。
- ㉔ 津巴布韋開始於2000年7月的土地改革,通過強制徵收白人農場主的土地重新分配給黑人,在解決歷史遺留的土地不平等問題上取得了一定成效。但由於黑人不善經營而導致的農業生產力下降、經濟崩潰和社會動盪,也產生了一系列嚴重的經濟和政治後果,這種激進的實施方式及負面影響使得這一政策備受爭議。
- ㉕ 詳見布萊恩·拉夫托帕洛斯, A·S·姆拉姆博(著),張瑾(譯):《津巴布韋史》,上海:東方出版中心2013年版,頁263。
- ㉖ Fredric Jameson. (1986). *Third world literature in the era of Multinational Capitalism*. *Social Text* 15, p. 69.
- ㉗ John A. McClure. (1995). *Postmodern/Post-Secular: Contemporary fiction and spirituality*. *MFS Modern Fiction Studies*, vol. 41, no. 1, p. 148
- ㉘ 原文中為紹納語。紹納語是津巴布韋本土語種之一,這句話與其內容也刻意呈現了這種「本土性」,詳見 Shimmer Chinodya. (2005). *Chairman of Fools*. Harare: Weaver Press, p. 84.
- ㉙ 朱振武,袁俊卿:《流散文學的時代表徵及其世界意義——以非洲英語文學為例》,《中國社會科學》,2019年第7期,頁144。
- ㉚ Randall Louis Davenport. (1977). *The bourgeois rebel: A study of the been-to in selected West African novels*. Northwestern University, p. 103.
- ㉛ HAN Wenting. (2022). *Combining magic with realism: Ben Okri's writing of Africa*. *Asia-Pacific Journal of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2(4), 013–020.
- ㉜ Nadine Gordimer. (1973). *The black interpreters*. Johannesburg: Raven Press, p. 27.
- ㉝ 格奧爾格·勃蘭兌斯(著),劉半九(譯):《十九世紀文學主流》,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81年,頁13。
- ㉞ Kizito Zhiradzogo Muchemwa. (2001). *Zimbabwean Literature (Prose)*. Harare: Zimbabwe Open University, p. 103.
- ㉟ 易曉明:《伍爾夫〈到燈塔去〉的性別解讀》,《英語研究》,2016年第1期。
- ㊱ 蔣花:《萊辛的世界主義視角和敘事移情策略研究——以〈蟻塚〉為例》,《外國語文》,2021年第4期。